

□ 马奔腾

## 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概述<sup>\*</sup>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经济学界的最突出变化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并得以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得以传入和普及。这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和中国现实状况相适应的。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后为了斗争必然会介绍和传播包括货币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币制的纷歧论争和极度混乱也迫切地需要一科学的货币理论来解决这一混乱局面。在上述主要因素的作用下,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被传入中国,虽姗姗来迟,但马上便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形成了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盛况,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货币实践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马克思主义货币基本理论的传播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货币理论主要包括货币起源论、货币本质论、货币职能论、信用货币论、货币流通规律等。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传播最初始是对其基本理论的传播,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有关货币理论的继承和传播。

#### 1. 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的货币起源理论的传播

马克思的货币起源理论最先是通过日本的一些译著传入的,主要有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高畠素之的《资本论大纲》,山川均的《实用经济学》等。这些译著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30年代始俄国译著增多,使俄国的译著取代了日本的译著。俄国的译著主要有R·卢森堡的《新经济学》,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等。上述译著中,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则是经过多次再版的中国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较好教材。而后者对货币理论的论述比前者更集中、更系统些。河上肇在分析价值形态的四种形式时指出,“在第三种的一般的价值形态和现在研究着的货币形态之间,却没有那样的本质上的差异,……,不再移动的时候,这个特定的商品——即是说,独占着等价形态的商品——就变成了货币,同时,由这种商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形态,也变形为货币形态了。”<sup>①</sup>列昂捷夫也说:“货币是由交换中自发地产生的。”<sup>②</sup>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自著的经济学、货币学著作中也论述了货币起源问题,而且都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系列成果之一,课题负责人张家骧教授。

继承了马克思的从商品价值形态发展来说明货币产生的分析方法。最早对货币起源有所论述的是王学文。他在1930年2月至3月所写的《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一文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分析了商品的四种价值形态。随后杨明山在1931年《新经济学ABC》一书中和王学文相类似地论述了货币起源问题。他们二人的论述都比较简单,只是指出了四个价值形态,简略地做了分析。从陈启修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或货币学著作中对货币起源的分析都比较详细、系统。只是每个人的侧重点和风格不同,有的注重对马克思货币起源的理解而有较多的个人发挥,如陈启修。有的注重对其原理的分析因而强调原理的阐释,如沈志远、李达等。客观地讲,货币起源论在陈启修的《经济学讲话》(1933)中主要内容已被介绍,经过沈志远在准确性方面的补充,从物的关系深入到货币表面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李达则在继承他们两人论述基础上又增加了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可以说,到李达时,马克思主义货币起源论已被较完整、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此外,李达、杨培新、黄宪章等还为中国货币起源做了一些探讨和分析。

## 2.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货币本质理论的传播

货币本质理论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和关键。因而传播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对货币本质的剖析。在上述日本和俄国的译著中,以河上肇和列昂捷夫的介绍较为详细。河上肇主要是从货币是抽象劳动的代表者,从一般的等价物角度,揭示货币的一般使用价值本质,列昂捷夫主要从其掩盖所代表生产关系角度说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本质。此外,宫田保郎的《货币的实际知识》(赵乐人译,1937年)和G·加兹罗夫的《货币信用论教程》(汪耀三译,1939年)二书中对货币本质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如宫田保郎指出:“货币是扮演着一般等价这一任务的特殊商品。”<sup>③</sup>G·加兹罗夫指出:“货币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之直接的体现物。”<sup>④</sup>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货币本质进行了分析,陈启修的分析较为复杂,从形式上、表现上、实体上、意义上、作用上等五个方面来说明货币本质,其中把一些货币的职能体现也做为本质来论述了。沈志远比较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货币本质理论,揭示了其是抽象劳动的体现者,是商品生产者交换联系的形式,是私人劳动并合到社会劳动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即明确揭示出货币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性、商品价值性,但没有明确指出货币是商品经济矛盾之必然的运动形态。李达在这一点上做了补充,从而较为完整、科学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货币本质理论。李达的货币本质的概括较为准确,又较为深刻,他指出:“货币是一般的等价物,是商品价值的一般的体化物,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之物的表现,是商品经济的矛盾之必然的运动形态,——这就是货币的本质。”<sup>⑤</sup>此后的黄宪章、杨培新、彭迪先等也都对货币本质进行了分析,但在基本内容上已没什么突破,只是使其进一步通俗化,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货币本质理论的广为普及。货币本质理论的科学传播和理解,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基本理论的掌握,而且有助于运用其对错误货币理论的批判。

在货币本质理论的传播中,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也被继承和介绍。陈启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著著作中最先批判货币拜物教的。此后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王思华、邓克生、莫迺群等也对货币拜物教进行了批判和分析。他们都是从商品拜物教始,通过对货币现象掩盖的人与人交换关系的揭露,批判货币拜物教,有的还揭露其资产阶级性质。其中,李达的分析最为全面和深刻,除上述内容外,还分析了其与商品经济同生共灭的历史性质。

## 3. 货币本质体现的货币职能理论的传播和运用

货币职能是货币本质的体现,对货币职能认识不同则对货币流通规律、货币价值的认识也会相应不同。马克思把货币职能归结为五个方面: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这是对货币职能的科学概括。马克思货币职能理论最早也是通过日本、俄国的一些译著传入的。尤其是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完全继承马克思对货币职能的论述体例,分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当作价值物本身货币三节来论述。其他学者则是分别论述每一个职能。译著基本上对货币职能理论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中国学者最早论述货币职能的是王学文。他在1930年8月《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一文中指出:“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等的机能,演着种种的角色。”<sup>⑥</sup>但他的论述过于简单。此后陈启修、沈志远、李达、王亚南、黄宪章、杨培新、彭迪先、薛暮桥、邓克生、王思华等都对货币职能理论做了介绍,不过有的介绍的是五个职能,有的认为是四个职能(没有论述世界货币职能)。以上学者中,以陈启修、李达、王亚南对货币职能的论述较具个人特色。陈启修认为马克思的货币职能理论内容不仅仅是马克思在货币职能一章中所论述的,而应包括在其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论述。他把货币职能分为国内职能(包括四个)、国际货币机能(包括五个)和资本货币机能(包括四个)三大部分,共有13个职能。其理论不仅过于庞杂,而且理解也不准确,缺乏科学性。把货币职能在特殊领域的具体表现当做货币职能的一般理论,尤其是把资本的职能错误地等同于货币职能。李达对马克思货币职能理论的传播较为详细系统。每种职能的含义和基本特征,诸职能之间的关系、货币职能和货币本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诸机能与商品矛盾运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李达都做了论述,其后的学者在内容上则不如他的全面、深刻。王亚南对货币职能的论述则最具特色。他重点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货币职能基本理论的阐释上,而是运用这一基本理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货币职能的特殊性进行较为深刻的理论剖析。指出了中国货币职能在当时无论何种表现都是不完整的、畸形的。他的分析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货币职能理论为指导的,较为科学地揭示了中国货币的特性,体现了较高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职能理论水平。李达、王亚南在马克思主义货币职能理论的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

#### 4. 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理论的传播和运用

货币流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同上述货币起源、本质和职能理论的传播一样,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也是最先通过日本、俄国的译著传入和介绍的。如河上肇就分析了没有信用情况下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决定,并以字母来表示马克思的计算公式。

中国学者的自著著作中也纷纷对货币流通规律进行介绍和传播。从陈启修开始,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及计算公式,以后的沈志远、李达、黄宪章、杨培新、彭迪先等人也都进行了介绍和阐释,<sup>⑦</sup>只是后来的学者们在阐释中比前人多用一些中国实际例子来说明,更易于被接受。其中杨培新比较特殊,他不仅在理论上分析论述了货币流通规律,而且还对当时中国乱发纸币所造成的流通中货币数量剧增导致的通货膨胀做了深入地详细地探讨,分析研究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揭露了其最终根源是国民党实行反革命内战的财政赤字。杨培新运用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分析中国的具体实践,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规律的运用上杨培新做出了较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纸币理论主要包括纸币产生、纸币本质、纸币与金属币之间关系以及纸币流通规律等内容。一些译著中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做了分析。如米哈列夫斯基已经明确认识

指出纸币产生于货币流通手段以及纸币的价值决定于其所代表的金融货币数量；列昂捷夫则明确认识到了纸币是金的价值符号的纸币性质，但又认为纸币币值稳定既要保证其发行额不多于周转所需数目，还要保证其能兑换黄金，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传播介绍马克思纸币理论的同时，又科学地加以运用和发挥。突出地表现在运用纸币流通规律揭露分析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现象及本质。陈启修对纸币的认识分析比较少且缺乏准确，没有明确论述纸币本质，没有从纸币和金属币之间关系来分析纸币流通规律。沈志远对纸币分析也较为简单，只简要地分析了纸币产生于货币流通手段，指出它是金的代表。对纸币理论分析较为详细的是李达，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纸币的产生、本质、纸币和金属币之间的关系以及纸币流通规律，并且以专章分析了通货膨胀。李达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在理论的通俗化方面有所作用。当然，在对纸币的认识中，一些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科学。如薛暮桥把纸币与辅币相同，邓克生的纸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还是支付手段职能的认识模糊，最普遍的在传播马克思纸币理论中对纸币币值稳定的论述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兑现方式，有的主张以控制数量和兑现同时并举。前者如沈志远、李达等，后者如陈启修等。这种错误认识是受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特别是在纸币数量根本无法得以控制的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错误货币理论的批判

西方资产阶级错误的货币理论主要有货币金属论、货币名目论和货币数量论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继承马克思对这三大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又运用马克思货币基本原理对现代的上述错误理论的情况特别是货币数量论进行了批判。

### 1. 对货币金属论的批判

从陈启修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沈志远、李达、黄宪章、杨培新、彭迪先等就对金属论做了批判。陈启修和沈志远的批判较为简单，理论力度不够，多从不能回答的现实问题反驳。李达的批判在理论上较为全面和深刻。可以说以后的学者的批判没有多少突破。归纳起来，中国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金属论：第一，从金属论者不懂得货币与商品的本质区别，从而把货币看成仅仅是商品，是与其他商品相同的东西来批判。第二，从金属论者否认纸币的错误认识方面来批判。第三，对金属论者只从物与物之间关系，不从其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认识货币的错误方面的批判。第四，对金属论片面强调货币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的错误的货币职能理论批判。

### 2. 对货币名目论的批判

对金属论的认识和批判，学者们具有较多的相同之处，表现为较强的一致性。而在对名目论的批判中则认识上具有较大差异。陈启修和沈志远把名目论等同契约论来进行批判。李达、杨培新则是从整体上对名目论进行批判。黄宪章和彭迪先则把名目论划分为若干派别较为具体详细地进行批判。主要分为货币固定说、货币职能说、货币票券说三种来批判。在对名目论的历史，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上，他们的论述不完全一致，分析概括的详略也不同。综合他们的论述，对名目论的批判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纸币完全脱离金属货币的错误认识批判。第二，对其货币没有内在价值，其价值由人的意志所规定的错误货币本质批判。第三，对名目论所无法解释的纸币在通货膨胀期间虽三令五申却依然贬值的现象等的列举批判名目论。第四，对名目论的静止的、片面的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

### 3. 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货币数量论是近现代影响较大、流行较广的一种错误货币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批判经历了一个继承和发展过程。陈启修、沈志远在批判错误货币学说时还没有把货币数量说作为一个批判内容。从李达开始,中国学者才对其做为错误货币理论的重点进行批判。李达、对货币数量说的批判是从整体上有重点地进行批判,主要从费雪的交换方程式、纸币理解、现代恐慌问题的认识等方面进行批判。杨培新把货币数量论分为机械的货币数量说、费雪的数量说、马歇尔和凯恩斯的学说三个派别来进行批判。黄宪章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分类最多,分为绝对数量说、相对数量说、费雪的交换方程式、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现金余额说、霍屈莱的消费者支出说及凯恩斯的所得说等六种派别。他的批判最为详尽。

综合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货币数量论。第一,对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形成于流通过程的错误货币本质以及唯购买手段的错误货币职能的批判。第二,对货币数量论的纸币数量决定其价值,纸币没有内在价值与金属货币无关的错误纸币理论的批判。第三,对货币数量论者的货币数量决定价值的数学公式的错误推定批判。第四,对货币数量论所持的经济恐慌源于货币问题,调控货币数量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错误观点批判。第五,对货币数量论的纯粹数学研究方法,只注重事物数量关系的错误方法的批判。第六,对货币数量论企图通过货币管理为资产阶级谋利加强对雇佣劳动剥削的资本主义辩护性的批判。

## 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对中国当时的错误货币理论和政策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始终伴随着对中国的错误货币理论和政策的批判,是在斗争中被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的。

### 1. 对中国当时错误货币理论的批判

这主要体现为对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货币的批判,以揭露外国帝国主义对华的货币侵略,科学地论述中外货币关系。这一问题论述较多的有章乃器、王学文、钱俊瑞、骆耕汉、王承志、寿进文等。其中章乃器、钱俊瑞和王学文的论述较为集中和深刻。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性有着较为详细地分析和论述。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以及他和钱俊瑞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二书中对东三省、两广等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做了揭露,特别是对中国封建割据下货币极度混乱状况有着较为详尽的揭露。王学文在1939年的《中国经济大纲》一文中也对此做了分析。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指出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货币经济,掠夺中国货币权的丑恶行径,叙述了美、英、日三个主要国家的争夺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基本理论分析揭露了中国当时货币特性,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当局及御用文人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货币权的掩饰和辩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此外,还有当时两种货币理论。一是阎锡山的物产证券论,一是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信用合作社理论。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主要是孙冶方;后者则主要有李紫翔、陈晖、骆耕漠、狄超白、罗浚等。孙冶方主要指出了物产证券论的货币没有内在价值的错误货币本质,及其以劳动时间为衡量价值尺度的不可能,还深刻指出这种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对后一种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揭露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而是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财政和金融危机构对其整个统治的威胁,为能继续保证其内战需要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举措,并且一针见血指出

了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有助于农村高利贷的复活,农村经济丝毫没有复苏,反而加速了其崩溃。

## 2. 对国民党政府货币政策批判

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通货膨胀政策,利用通货膨胀为其内战做准备和基础。对此揭露批判较多的是杨培新和彭迪先等。其中杨培新在《通货膨胀新论》一书中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剖析。揭露了其政策最终掠夺人民财富的反动本质,指出了其最终根源是内战导致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所谓“反通货膨胀”政策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运用和丰富。

## 四、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货币实践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其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总结创造出了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理论,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事革命根据地货币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有:薛暮桥、曹菊如、毛泽民、姜君臣、林伯渠等。他们(主要是薛暮桥、曹菊如)提出了一系列货币发行方针、政策和理论,大多是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敌货币斗争要把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结合,以经济力量为主。主要是薛暮桥提出的,指出要把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在本币处于劣势时,多借助政治力量,反之则多依靠经济力量。

2. 遵循客观规律开展对敌货币斗争。薛暮桥和曹菊如都强调开展货币斗争要遵循客观规律。主要指出的论点有:对本币和法币的关系上辩证对待,从利用到逐渐排斥,而不是一开始就禁止法币;本币的发行数量要根据市场流通的需要随时调节,曹菊如提出货币发行数量以购买力指数百分之一百四十为基准的经验规律,薛暮桥提出货币发行时间要与季节相适应的规律;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要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货币斗争策略规律;适时统一货币等。

3. 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是解决货币问题的关键。由于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制度就必须是独立自主的,薛暮桥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建立独立自主货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4. 以物资做为本币发行保证及其维持币值稳定基础的“物资本位”制。马克思所认为的发行准备及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大都是以黄金做为准备金的。薛暮桥、曹菊如等根据革命根据地缺乏金银而自然经济比重较大、物资有着超过金银的重要性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以物资做为发行准备和维持本币币值稳定的基础的“物资本位”论,并以其指导本币的发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可以和商品相联系,但论述很少。中国学者的这些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大丰富和成功运用。

总之,从五四至建国这30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传播介绍并且丰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曾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而且坚定地将其做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科学理论而继承下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科学和伟大。

#### 注释:

- ①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经济学社版,1949年,第70页。
- ②列昂捷夫:《政治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7年第3版,第153页。
- ③宫田保郎:《货币的实际知识》,赵乐人译,1937年版,第37—38页。
- ④G·加兹罗夫:《货币信用论教程》,汪耀三译,光明书局,1939年版,第17页。
- ⑤李达:《货币学概论》。《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545页。
- ⑥王学文:《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王学文经济文选》(1925—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41页。
- ⑦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存在支付情况下的表述学术界对比有争论。主要是对“减去”还是“除以”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具体争论可见王惟中的《〈资本论〉专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是中文翻译错误,应是“除以”。

#### 参考文献:

- ①陈启修:《经济学讲话》,上海乐群书店,1933年版。
- ②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北平经济学社,1934年版。
- ③李达:《经济学大纲》,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年版。
- ④薛暮桥:《经济学》,上海新知书店,1940年版。
- ⑤邓克生:《新经济学讲话》,写读出版社,1940年版。
- ⑥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
- ⑦杨培新:《新货币学》,致用书店,1947年版。《通货膨胀新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
- ⑧彭迪先:《新货币学讲话》,生活书店,1947年版。
- ⑨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⑩曹菊如:《曹菊如文稿》,中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邮编:430064)

#### · 简讯 ·

## 《会计审计人员必备管理知识手册》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我校有关专家、学者编撰的《会计审计人员必备管理知识手册》一书,全书77.6万字,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影响较大,颇多好评。

该书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汤云为教授任编委会主任、会计学系竹德操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顾问)任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

本书的实用性很强,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关键处往往辅之以“实例”深入浅出,重点突出,是会计审计教学工作者、经济工作者的极其有用的参考书。

(亦 鸣)